



思维模式转换:从古代校讎学 to 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路分析*

□ 龚蛟腾 朱潇娜

摘要 借助思维模式的转换,梳理古代图书馆学的近代化发展,是深入学术本质明其理、察其变、承其续的根本方法。主客合一思维模式向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转换,正式拉开了古代校讎学向现代图书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学术指向因本体观念的转换从教化万民向凸显学术功用转变,学术特质因认识特性的转换从人文之术向管理之学发展,学术内容因运思方式的转换从价值向的经验总结调整为知识向的学理内容,学术体系因语言方式的转换从杂糅合一向逻辑分明优化。并由此引发了关于价值与知识、人文与科学、顿悟与分析、意象与概念等学术本质的思考,以异中求同的方式探寻古今学术一脉相承的所在。

关键词 古代校讎学 图书馆学 思维方式 学术转型 创新发展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2.06.015

1 引言

前期研究成果表明^[1-5]：“中国古代不仅出现了西方望尘莫及的图书馆事业，而且诞生了西方难以望其项背的图书馆学——校讎学（目录学）”。然而，因文化语境的不同与悠久的学术发展史，校讎学的概念界定与研究范畴在学界尚未形成一致观点，尤其是校讎学与目录学的范畴之争，在整理国故运动的助推下愈发突出，以致今日言及校讎学或古代目录学，需首先理清两者关系。实质上，校讎学与目录学的相关争论，与两者概念模糊、治学内容杂糅有关。自古以来，关于校讎学与目录学的相关认识便众说纷纭。《校讎广义》详细记载了校讎学与目录学的发展历程^[6]。其中，校讎二字始于西汉刘向，其定义为“是正文字”；而《国语·鲁语》有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则次第篇章，亦称校也；后郑樵之《校讎略》涵盖求书、校书、类书、藏书范畴^[7]；章学诚之《校讎通义》则将部次甲乙、辨章学术、申明大道视为向歆校讎学真义^[8]。此为古代学者对校讎学的不同认知。而近代学者不以为然，向宗鲁认为，辨章学术为校讎之余事，是正文

字为校讎学之本务^[9]；胡朴安、胡静道则认为，校讎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校讎学为“是正文字”，广义校讎学则为“凡一切治书事业均在校讎学范围之内”^[10]；孙德谦著《刘向校讎学纂微》，虽未直接定义校讎学，却以全书内容阐明刘向之校讎涵盖一切治书之举^[11]。同样，目录学与校讎学同病相怜。目录之说自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旨意”为始，至班固“条一书篇目之义为定群书部类，撮一书旨意之义为别学术源流”为目录，而后学者承响其说引申为治学步履之法。可见，有关校讎学与目录学的治学范畴在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处各有论说。相较于校讎学，古人对目录学的认识多聚焦于“条篇目、撮旨意”方面。若以向歆之校讎事业为基准，考量古代学术的会通性，则会发现古代校讎学与目录学未有泾渭之分。更为确切地讲，目录学涵盖于校讎学之内。而近代新学日盛、治学之法细化，校讎学学术体系之下的校勘、目录、版本、考据等功用凸显。于是，“校讎学在近代逐渐分化成拥有目录学、图书馆学、文献学等诸多子学科的‘文献类学科群’，其中图书馆学日渐扩张而承其主体”^[12]。而图书馆学承载古代校讎学之

* 中国图书馆学会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建设背景下图书馆学学科变革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2LSCKYXM-ZZ-ZD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龚蛟腾，ORCID:0000-0001-7765-2822，邮箱：jtgong2005@163.com。



主体亦有据可依。倘若以近现代图书馆学的治学内容为模板比照古代校雠学,可以发现两者虽名称各异、治学范式不同,但内容却是基本一致的,且不说治馆、治书的相关内容古今皆有,现代图书馆学的核心部分——知识组织在古代校雠学中亦有迹可循。譬如知识组织中的文献分类法对应古代的七分法与四分法,目录检索对应古代的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地方文献目录、丛书目录以及根据七分法或四分法形成的“分科”目录;知识服务则对应于古代提要对文献内容的揭示与注释上。确实,中国古代没有图书馆学之名,也未形成如近现代图书馆学一样的学科体系,但其核心思想——藏用思想,却远远超出了西方图书馆业务范畴^[13]。正如程焕文所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理论不仅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藏书的发展变化,而且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还走在世界图书馆学历史发展的前列”^[14]。毋庸置疑,诞生于文献整理与管理基础之上,综合治书、治学、治馆知识体系的古代校雠学,就是古代图书馆学。那么,为何古代图书馆学存在的合法性及其存在形式迟迟难以获得近现代学者的一致性认可!或许,这与治学之根本——思维方式的变革有莫大的关联。思维方式转换对治学研究而言,不仅是学者思维方式或研究方法的转变,其对治学对象、治学旨趣、内容特性以及学术表达方式皆有影响。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天人合一”思维。“天人合一”从儒、道、释层面讲,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从思维模式上看,则是冯友兰所讲的主客合一思维:“在中国人之思想中,迄未显著的有‘我’之自觉,故亦未显著的将‘我’与‘非我’分开……”^[15]。换句话说,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思维模式将主体之我与客观非我看作一体,其对自然万物的探索实质是对主体之我的认识。而近代西学东渐舶来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西方哲学从探究客观世界的本质开始”^[16],探究客观世界的本质,必然将客观外物与主体之我分离,形成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这是中国思维方式近代化发展的最大变化。主客合一思维模式下的古代哲学采用内倾性的直觉体悟思维探究人类的主体世界,并形成相应的富于暗示的意象语言来传达思想。而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下的西方哲学通常采用向外审视的思维习惯,以逻辑分析的治学方法探究客观世界的本质,运用一览无余的概念语言来诠释内容。古

今学术环境的差异以及治学思维的不同,令中国图书馆学乃至中国学术呈现出古今之间的“断层”。若以思维方式的转换为线索,从“本体论”“运思特性”“治学方法”“表达形式”的古今转换中梳理古代图书馆学的近代化发展,深入思维深处探究其学术转型的本真走向,既可以从本质上认识古今图书馆学的差异性与共通性,又能从学术之本的角度揭示内含于断层表象之上的古今图书馆学内在发展理路。

2 传统思维模式孕育古代校雠学

2.1 自我本体衍生校雠学教化价值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孕育出人本主义倾向的自我本体,自我本体的存在令古代校雠学形成了“教化万民”的治学旨趣。“中国哲学认为,宇宙的终极实在必得通过人的存在境界呈现出来,而人的存在境界也就代表着宇宙的终极实在”^[17],通俗讲,主客合一思维模式下,古人对宇宙万象的认识实质是对主体之我的探索,认识万物就是认识本我,这便是自我本体思维的真意,也是古代治学研究不为求知、而为求道的根源所在。求道,即如《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8]。于是,自我本体思维中古代文献与学术存在的终极旨趣,与其说是文化传承与治学研究,不如说是辅助主体修身养性臻于至善之境。基于此,作为“治书之学、治学之术、育人之道”^[4]的古代校雠学,因传统学术的主体倾向相应地具备了超越学术价值的人伦价值,衍生出“教化万民”的社会功用。具体而言:

(1)保存经典延续教化之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古代中国人对图书馆实践方法进行经验总结而形成的方法论体系和思想观念体系”^[19]。殷商时期王朝官员利用甲骨卜辞治理天下,由此诞生了能够存放、整理甲骨文献的专门场所,可视为中国有史可考的最早的图书馆。此后历朝历代建立初期,十分重视修备专门藏书处所,设写书职官,于文献搜求、整理上煞费苦心。历代官府如此重视藏书建设,只因所藏之书为载道之资,内含圣贤之说、育人之道、治国之法。可见,被冠以“重藏轻用”之名的古代藏书却有“以藏为用”的用意。

(2)释学明道以化万民。教化不同于教育,所谓“政以体化,教以效化,民以风化”^[20],教化之重心,在化不在教,强调春风化雨般的潜移默化。古代图书馆学考量到文献内容中的人伦内涵,衍生出“申明



大道”的治学取向,便就此具备了教化之资。所谓“申明大道”,是指“古书目录通过组织文献、考辨学术的现实层次,致力于追问文献体系与学术体系背后的政教人伦价值”^{[21](62-63)}。换言之,古代校雠学利用文献采集、整理与利用的治书之法揭示文献所载之道,以治书、治学为中介激发申道之主体与客体内含的道德取向,令其产生超越时空的价值共鸣,以此达到教化之目的。

(3)教而化之以正人伦。古代校雠学以申明大道之法挖掘学术背后的价值内涵,辅以彰善瘅恶的文献采集、重道轻器的文献组织、知人论世的提要撰写,重新构建符合人伦纲常、国朝纲纪的文化体系,达到以部类文献秩序之法传达明于庶务、察于人伦、以行善道的教化理想,最终实现规整人伦、正化社会秩序的教化价值。

2.2 内向思维主导校雠学人文范式

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是指世界的本原或实在之物的本性,主客合一思维模式孕育的自我本体,就预设了古人认识万物的根本目的在于探索本心,于是,向内审视是古代各种思维方式的共性。对学术研究来讲,内向思维不仅意味着研究方式以向内审视为主,还代表着其治学核心聚焦于主体修养上。古代校雠学在此影响下具备了普遍的义理倾向,即“一整套关于建立和谐社会、积极人生的意义体系的理论,意义追求始终是义理之学的根本目的”^[22]。换句话说,古代校雠学在治学研究中处处以人为主,学术内容具有鲜明的人伦倾向,进而形成了不同于近现代人文精神的独特的人文范式,即:

(1)以严为去取的文献采集净化人伦风气。严为去取的标准,指文献内容是否合乎人伦纲常之正道,是否益于个人道德之修养,是否利于国家纲纪之稳固。如唐朝官府主持编纂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所采文献为:“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23];又如清朝官府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24],因姚广孝、严嵩德行有亏,有碍正道,删其文献只存其目,并加以斥责,以彰善瘅恶,敦崇风教。可见,古代校雠学通过文献采集严格筛选世存文献,杜绝杂书乱圣经的现象,保证学术清明。当然,文献采集还有郑樵的求书八法,其细致全面的求书之法为后世文献整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以重道轻器的分类原则照应义理取向。重道轻器是典型的传统学术思想,从义理之学的角度

讲,道学是专门研究义理之学的道理,器学则是鲜少体现义理之学的术。以重道轻器为准则的文献分类或知识分类,通过文献排列的先后顺序凸显义理之尊。如汉代向歆开七分法之先河,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类分文献,儒家的六艺置于文献分类之首,正是为凸显义理之学——儒学的独尊地位。而后,班固遵循向歆分类法例撰写《汉书》,仍尊儒学为首。随着传统学术体系的细化与文献数量的增多,七分法最终演化为四分法,但其尊经、重史、轻子、鄙集类别设定,仍照应着义理之学的价值取向。

(3)以敦善去恶的书目组织凸显人文信念。自我本体与内向思维互为因果,内向思维强调的反身以诚、反身而求,实质是对自我本体的追寻。于是,古代校雠学的人文精神可以理解为以其治书、治学之术敦善去恶、肃清学术环境,关照古人内心修养的治学追求,达到教化万民的学术理想。而敦善去恶本身便带有主观取向的价值评判,这就默许了治书、治学过程中的主体介入,譬如等差有别的著录规则、知人论世的文献标引、价值主导的内容评判、崇儒重道的类表构建等等。换句话说,书目组织以主体介入的方式整理文献,既从治书、治学的层面关照了主体精神,亦从社会层面照应了人文需求,可谓一举两得。

2.3 直觉体悟影响校雠学内容特性

直觉体悟是天人合一、主客一体思维模式下最典型、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其以自然万象为基础,采用主体之直觉、顿悟参透其中的自然法则,获得关于客观外物与主体之我的综合认识。相较于西方逻辑推理的论证、分析之法,直觉体悟更多依赖于主体的认知积累、万物化一以及冥思领悟能力。是故,诞生于直觉体悟下的传统学术不善论证与推理,主观取向鲜明、价值论内涵突出。传统校雠学置身于此,潜移默化地具备了相似特性,具体而言:

(1)生于价值论之上的知识论内容。前文提到,古代校雠学是以治书之术追寻遥契大道的圣道原典,以治学之法揭示存在于文献之内的价值内涵,以修经治世之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深入分析,此处存在两个相互影响的向度,即文献之内的价值论内涵因校雠学的知识内容得以昭示天下,而校雠学知识内容的存在形式与存在价值受文献价值论内涵左右。而对接两个向度的结点,



便是直觉体悟思维下,学术内容带有的主体精神与价值取向,当然,这也是自我本体与内向思维特性在直觉体悟思维方式上的体现。

(2)即器明道总结实践经验。中国传统学术有道、器之分。主客合一思维模式下的道,为修身之道、成圣之道,是主体对自然万象运行规则的参透,是直觉体悟思维的结晶;器则是悟道之基础、明道之所在,存在具体的载体与形式。相较于经典道学,古代校雠学作为治书、治学之具,属于器学,其学术内容不是由主体顿悟所得,而是在辅助主体悟道过程中积累的有关治书、治学之实践经验。换句话说,校雠学以治书、治学的工具性内容为读者即器明道做准备,其本身便诞生于即器明道的经验总结中,如《校雠通义》曰:“本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8](48)}。”这也是校雠学产生近两千年来,仍未系统成学的原因,也是重道轻器治学环境对器学的限制。

(3)好常恶变稳定学术范式。与自我本体、内向思维相同,直觉体悟思维同样将思维重心置于主体本身,它并不是以主体的直觉、顿悟去不断探索客观世界的真理,而是探究修身养性、安邦治国之法。是故,传统社会整体处于安常求稳的发展状态,这为古代图书馆学提供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学术环境。自西汉时期,向歆治书之举形成古代图书馆学“考辨学术源流、申明大道”的学术范式后,后世学人经过漫长的文献整理与管理活动,虽完善、发展了图书馆学内容体系,但其学术范式与学术范畴仍延续旧典,直到近代思维方式的转变与西式学理的引进,才走向“自动实用”的学科之路。

2.4 意象语言杂糅校雠学学术思想

内向思维以自我本体为主导,综合内省、外求采取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通过对宇宙万象的反复观察、提炼,再以本心之顿悟、感受攫取其中蕴含的意、理、情。主体顿悟所得结果无法通过概念语言给以准确的描述,需要运用大量象征、比喻的手法,借助个别的、具体的形象去呈现事物本身,这便是中国典型的意象语言。在意象语言的影响下,古代校雠学若要实现治学目的,需得通过知人论世的提要撰写介绍著者生存年代、社会环境、行为处事、道德品行,复刻著者所处情景与心境,为读者提供一种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认识情境,帮助读者顿悟文献所载的主体精神。而校雠学自身的学术体系也在意象语言

的影响下,形成了独具古代文化特色的“意象性”学术思想体系:

(1)学术名称概念不明。中国古代有图书馆学之实,却没有图书馆学之名。校雠学作为专于文献整理与管理的学术,早在汉代向歆父子主持的大型文献整理活动中便已成型,“产生集考、辨、校、分、编等于一体的‘治书之学’理论”^{[1](66)}。但是,受意象性语言的影响,古代学者不善于或无意识以抽象性、概括性判断定义对象,校雠学的概念界定与研究范畴始终没有明确论说,因此,对校雠学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一般通过校雠实践活动所展现的经验内容来自行把握。

(2)类名设置疏于定义。疏于定义类名设置是指类名无确切的内涵与外延,“归入某‘类’的若干文献,并不具有学科属性和逻辑类项上的本质性之‘同’,而只意味着文献内涵在编目者的主观心理现实之上可能形成的分组”^{[21](184-185)}。换句话说,文献归类不是依据文献内容的学科归属与类名定义的概念指向所形成的对应关系,而是编目者以其主观认知寻找文献内容与类名之间隐含的价值关联,由此形成的学术分类。于是,惯以学科属性类分文献的近代学人,在看待传统文献分类时总有“杂乱无章”的感觉。

(3)学术体系杂糅为一。具备内涵明确、外延清晰的学术概念,是构建逻辑合理、结构分明的学术体系的基础。古代校雠学围绕文献整理与管理,形成了涵盖文献采集、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传播等一系列有关治书治学的内容,学术系统综合庞大,内容杂糅不分。这是因为疏于定义与模糊表达的意象语言无法为学术体系提供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划分依据,只能笼括治书治学的实践活动,形成体系庞杂、边界模糊的学术系统。这就容易造成概念混乱、内容冲突等问题,近代学者对校雠学与目录学同实异名之争或有意象性语言不重定义的因素在内。当然,除意向性语言外,古代学术的会通特性也是校雠学浑然为一的原因所在。

3 创新思维模式催生现代图书馆学

3.1 实在本体映射图书馆学功用观念

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与逻辑思维的传入,催动中国古代主客合一思维模式向主客二分思维模式过渡,引发自我本体向实在本体转换,治学研究重心从



主体修养向客观外物发展,认识方式也从直觉体悟向逻辑分析调整。中国学术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就此颠覆,拉开了古代校雠学向近现代图书馆学演变的序幕。从治学研究层面看,自我本体向实在本体的转换实质是强调治学研究在避免主体意识形态干扰的前提下获得脱离主体价值干预的客观实在。于是,文不载道而载学、馆不传道而传学、学不释道而求真成为古代图书馆学面临的全新学术环境。图书馆学不再需要考量各方主体的价值取向或修养需求,只需将研究重心置于文献整理与管理的实际内容上。就此,传统校雠学中涵盖于价值论内涵之下的有关治书、治学、治馆的知识论内涵渐渐明晰,在新时代展现出其不同于教化价值的社会功用,譬如:

(1)藏以致用,专为民众利用。本体观念的转换慢慢淡化了文献、馆藏中的人伦色彩、价值内涵,因文以载道而偏重“以藏为用”的学术研究与馆阁管理,开始将重心转移到纯粹的利用上,“以藏为用”的馆藏理念就此转变为“专于利用”。正如刘国钧先生所讲的,“图书馆乃是以搜罗人类一切思想与活动之记载为目的,用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保存它们,整理它们,以便利社会上一切人使用的机关”^{[25](6)},图书馆就是搜集、管理图书以使用户使用的机关,其核心价值在于传播知识、助人求知。作为图书馆学的母体基础,图书馆观念的转变彻底改变了图书馆学的研究重心,传统校雠学因文以载道而具备的释道、明道、申道价值论内涵彻底转变为纯粹的治书、治学内容,图书馆学不再是道学的附庸,真正具备了独立存在的资格。

(2)专于文献整理,提高利用效率。图书馆馆藏理念的转变开启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新篇章。为了实现图书馆专于利用的发展趋向,近代图书馆学秉承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在既有经验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研究“文献分类体系、文献编目方法、读者服务工作、图书馆管理制度、图书馆业务管理”^{[1](182-198)}等内容,学习、引进一系列关于文献整理与管理的技术方法,寻求有效提高文献利用的治书之法以及符合当前学术体系的治学之法。详细标准的图书著录、按需求书的分类方法、丰富多样的书目推荐、专为读者服务的参考咨询等实践内容层出不穷、与时俱进,大大提高了文献的社会利用率。

(3)发展图书馆事业,开启民众智识。完善图书

馆管理、发展图书馆事业,可有效发挥图书馆社会价值。中国古代虽有四大藏书类型,但限于传统制度牵制,社会普及度十分有限。近代社会注重图书馆在文化普及、民众教育等方面的功用,非常关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由是,在国家支持下,近代图书馆根据不同文化层次形成了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儿童图书馆等各类图书馆,图书馆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工作组织、馆员培养渐趋完善。且随着图书馆规模的增长,馆与馆之间的联系、合作越来越密切,慢慢组织形成全国图书馆系统,以统一协作之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图书馆的社会功用。图书馆事业在图书馆学人的主导参与下慢慢壮大,在传播中华文明、保存中华文化、普及社会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3.2 外向思维培养图书馆学管理特质

主客二分思维改变了国人的思维特性,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从追问本心变为探索自然,用胡伟希教授的话讲便是“为自然立法”^[26]。探索自然或“为自然立法”必然将思维的重心转移到客观世界中,从认识特性上看便是由内向思维向外向思维的过渡。于是,实在本体映射图书馆学的功用观念,外向思维则将图书馆学的社会功用寄托于主体之外的文献、学术或图书馆的管理方面,图书馆学的管理特质在思维方式与学术特性的双重作用下就此界定。具体而言,则有几方面的表现:

(1)以机构管理为主体的学科内容。内向思维向外向思维的过渡将图书馆学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客观世界,而增进民智的时代需求与西学范式的借鉴式影响将图书馆学的研究视角集中在图书馆上,由此形成了以机构管理为主体的学科内容。从近代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近代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多集中在图书馆认知、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学科教育、文献整理等方面,如杜定友之《图书馆学概论》^[27],内容有图书馆的意义、略史、种类、组织、经费、建筑、行政、馆员、设备、规则……刘国钧之《图书馆学要旨》^[25],内容为图书馆学的意义与范畴、参考部与参考书、图书的阅览与推广、图书的分类、图书的编目、选购与登录、建筑与设备……皆是对图书馆管理与运行的研究,极少涉及人伦纲常、道德修养、政治教化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虽古今图书馆学的研究重心有所偏移,但基于图书馆属性的知识论内容是一脉相承的。



(2)以自动实用为追求的治学取向。“自动实用、厘清要素”^[28]既是近代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式,也是其最为迫切的理想追求。近代图书馆学将研究内容集中在图书馆管理与运行上,就是要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在理论研究的指导下,近现代图书馆的确表现出自动实用的优点,如文献标引工作用主题、类目表达文献内容,方便文献检索利用;著录工作将重心落在文献的外部特征,要求精准、真实的著录文献;文摘则对文献内容进行简要概括,将最为重要、最具价值的部分摘取出来,方便读者了解文献;目录组织则将对文献的相关记录组织起来,成为检索数据库,满足读者的不同检索需求。实际上,以图书馆管理为研究重心的近代图书馆学,必然会形成自动实用的治学取向。

(3)以管理门类为归宿的学科归属。虽然转型初期图书馆学的管理特性已较为明显,但将其归属于管理门类的做法还是一步步确定下来的。“过去,图书馆学曾依附于文学、历史学,后来又被视为从属于社会科学、应用科学。由于图书馆学要借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它还被认为交叉学科或综合学科”^[29]。随着图书馆学研究内容从图书馆管理向文献管理、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演进,图书馆学由机构管理之学慢慢提升到社会层面的知识管理之学,图书馆学的管理性质逐渐清晰,学科归属也由文科学科类调整到管理学学科类,其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得到专业教育的确认。当然,图书馆学的管理学归属并不意味着其人文属性的消解,恰恰相反,图书馆学的机构管理与知识管理内容必须坚守“以人为本”的原则,也只有以人为本才能赋予图书馆学以现实意义。只不过古今图书馆学的人文属性大有不同,一是为满足人的道德修养与精神追求,一是为满足人类对自由平等的向往。

3.3 逻辑分析创新图书馆学内容本质

逻辑分析法是西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下典型的治学研究之法,它在主体与客体截然二分的基础上,借助主体的判断、推理、归纳演绎能力探究客观规律,认识客观存在。与直觉体悟不同,逻辑分析法以质疑权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抽象构建认知体系,是建立现代学术知识体系的主要方法。以逻辑分析法取代直觉体悟治学思维的主流地位,是近现代科学实证精神在治学研究上的表现,其为古代校雠学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治学方法上的变革,具体表

现在:

(1)抽象认知推动研究内容本质化。受西方图书馆学与蓬勃新生的图书馆事业影响,近代图书馆学将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定位在图书馆机构上,形成笼括图书馆性质、作用、种类、学科关系等理论研究与图书馆经营、组织、管理、整理等应用研究的学科内容。随着国人对图书馆认识的深入以及理论研究步入正轨,学人开始思考图书馆现象不同表现形态下所具有的共同形式结构,采用抽象、推理的方式揭开作为“知识存在”的图书馆学本质,知识组织、知识集合、知识管理等理论内容将图书馆学研究深化、拓宽至人类普遍需要的知识层面,为图书馆学脱离经验总结开辟了新的方向。这是逻辑思维转变图书馆学学术形态的第一步,也是最根本的一步。

(2)摆脱实体限制,完善理论体系。前期研究成果认为^[30-31],图书馆的本质是公共知识中心,图书馆学是公共知识管理学。从这个角度看,图书馆既是知识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由是,图书馆学学术体系的构建,不仅要从事知识层面深化理论内容,更要从社会层面完善学术体系。譬如,从国家治理层面研究图书馆治理内容^[32],综合图书馆权利、图书馆制度、图书馆法治、图书馆事业、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等;从社会运动规律的层面把握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理论系统^[33],揭示出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技术本质、社会本质的物质形态,从个体知识与社会知识形成规律层面寻求学科形成的社会基础以及理论基础。显然,抽象认识令图书馆学研究不受图书馆或图书馆事业的实体限制,使其可以从社会整体甚至人类文明的层次、从社会关系或社会发展规律角度构建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3)紧跟时代热点丰富研究内容。与直觉体悟思维不同,逻辑分析法将思维重心置于客观世界,探索未知、求知求真逻辑思维的最终归属。是故,逻辑思维主导下的近现代社会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图书馆学若要不被时代抛弃,必须紧抓社会热点丰富研究内容。显然,以客观存在的图书馆本质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早已摆脱馆内机构或学科角色的限制,关注时代热点、关心国家发展规划、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成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重心。譬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公共数字文化现代化建设、“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倡议的推动、信息获取公平问题等等,皆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



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图书馆学领域的热点问题,从对科学技术的追逐慢慢向学科发展问题与社会现实问题转移,这表明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驱动力由技术创新向问题意识转移,理论发展更为合理。

3.4 概念语言构建图书馆学学科体系

“西方哲学在展开其哲学问题的论证时,首先要从明确定义入手,然后层层论证,最后上升到某个具有普遍性的结论”^[26]。也就是说,主客二分思维要“为自然立法”,必须通过逻辑分析方式层层论证,而这一过程的基础,是定义明确的概念语言。概念,作为逻辑思维的表达方式,通过从多个具体的物质形态中感知事物共同的、本质的特性,借助语言加以提炼、概括,对客观对象形成抽象的、确定性的、符合逻辑的描述,进而根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形成结构完备的认识体系。这是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化转型的基础。

(1)学术概念清晰化。概念语言以定义明确、外延清晰的判断赋予图书馆、图书馆学、图书馆的历史、图书史等术语以详细的界定,如杨昭愬之《图书馆学》定义图书馆为:“搜集有益的图书,随着大家的知识欲望,用最经济的时间,自由使用的地方”^[34];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定义图书馆学为:“研究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和使用法的学科”^{[25](2)}。”科学定义图书馆与图书馆学,为进一步构建综合经验要素、理论要素、结构要素的图书馆学学术体系奠定了基础。当然,不同的学者对图书馆与图书馆学有不同的界定,且不同时代对同一术语也有迥然不同的认识,这是随着学科发展的深化,概念更加抽象化、本质化、清晰化的结果。

(2)学术体系成熟化。近代图书馆学在明确定义系列概念的基础上,根据概念所表现出的本质属性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构建逻辑合理、类分明确的学科体系。如图书馆学家李景新从系统的图书馆学与历史的图书馆学两大方面构建图书馆学体系^[35];刘国钧先生以图书馆构成要素图书、人员、设备、方法四个方面构建理论体系^{[25](11)}。有学者在耙梳近代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总结、提炼、重构近代学科体系^[36],将其分为原理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三大类,每类之下再分小类,小类之下又有细化,细化之后又有具体,由此构建图书馆学四级学科体系,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围

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可以说,学术体系的构建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学科发展程度,是学科成为一门“科学”的标志。

从学科化角度来看,概念语言的运用赋予以校雠学为基础的会通性文献学科群以明确、清晰的界定,为传统文献群的近代化裂分奠定了语言基础。从意象语言的角度看,概念语言最大的特点便是赋予学术以明确的定义,或者说,赋予定义以明确的内涵与外延。相较于传统校雠学,以概念语言呈现的近代图书馆学更为鲜明、直观,更容易作为一门“学科”长久发展。

4 思维模式转换引发学术本质思考

4.1 价值与知识何为学术之本

“价值的最基本、最一般的含义,是指客体对主体需要的肯定或否定关系,是客体的本体属性价值化过程及其结果”^[37]。从图书馆学角度看,价值论内涵是图书馆学知识内容作为客体存在对人类主体产生的影响,其研究核心集中在有关文献整理与管理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应用中,其价值体现在研究内容的社会运用上。而在自我本体与内向思维关照下,古代校雠学的价值论内涵一般指向人的道德修养、社会的政教人伦,且将这一指向融入治学研究中,于价值论内涵之上构建了知识体系。这就造成了古代图书馆学重价值、近代图书馆学重知识的现象。那么,价值与知识何为学术之本?实际上,价值是知识的归宿,知识是价值的基础,价值与知识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存在。对古代图书馆学而言,其知识论内涵是指图书馆学作为文献整理与管理的专门学术,在治书、治学等方面积累的实践经验,它的存在使古代图书馆学具备了保存文献、传承文化、培育人才的学术价值;其价值论内涵是指图书馆学因回应道德本体的人本主义倾向而具备的“修己”“经世”的政教价值,它的存在使古代图书馆学具备了道德教化、襄赞政道的人伦价值。知识论内涵与价值论内涵的统一,令古代图书馆学在整序文化秩序的同时兼顾社会秩序,其以文治之具的角色实现社会人、文、治的统一,最终呼应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对近代图书馆学而言,其知识论内涵同样是图书馆学在文献整理与管理方面积累的实践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理论内容,它的存在令图书馆学以科学的角色矗立于学科之



林;其价值论内涵则是其知识论内容通过图书馆服务或学科服务获得与主体之人或群体社会的联系,以提升个体知识储备或社会整体进步来实现学术价值的社会化转换。由此可见,本体思维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图书馆学知识论内涵与价值论内涵的统一。无论是古代校雠学还是近现代图书馆学,都是知识与价值的结合,只不过古代校雠学因自我本体的主体参与性令其价值论内涵直接融合于学术体系中,譬如重道轻器的学术分类、彰善瘅恶的文献采集、知人论世的提要内容等。而现代图书馆学则因主客二分的治学思维,学术内容是纯粹的知识体系,其价值论内涵需要通过知识内容的社会化转换获得。由此看来,以知识为学术之体,价值为学术之本,本体兼具是中国图书馆学一以贯之的学术根本。

4.2 人文与科学何为学术之质

人文与科学何为学术之质,追根究底就是探求价值与知识何为学术之本。基于前文可知,图书馆学是兼具人文与科学性质的学术,但在认识特性影响下,古今图书馆学的人文与科学指向有所不同。内向思维下,以义理之学存在的传统学术令古代校雠学在治学与修身、知识与价值之间画上等号,从这个角度讲,古代校雠学就是人文之学。然而,将对人性的关照纳入治学的过程体系中,牺牲了校雠学知识体系的客观性与规范性。譬如其重道轻器的文献分类标准与以人类书的做法造成了知识世界的混乱,如杜定友所言,“学无门户而强分内外,经为宏道,史以体尊,子为杂说,集为别体,一以尊崇圣道,以图书分类为褒贬之作,失其本旨远矣^[38]。”尤其是官府主持的大型文献整理活动,因纲纪伦常的义理取向抹杀了大量的“失德文献”,造成了不少的学术损失。而科学,是不受价值干扰,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公式化、形式化的客观内容。可以说,形成于主体价值之上的古代校雠学虽有知识论内涵却与科学无缘,这也是为何传统校雠学需要近代化转型的一大影响因素。近代思维模式的转型令学术研究重心从主体修养向探索自然转移,如何去除治学研究中的价值干扰,成为近代图书馆学研究的刚性法则。于是,图书馆学的科学性慢慢建立,专于知识管理的学术本质逐渐清晰。而其对人性的关照,则表现在从理论内容中传达出的人性关怀,或知识内容在价值转换中对主体需求的满足。相较于古代校雠学,现代图书馆学的人文属性建立在科学知识之上,这就

可能导致其对科学过度关注令其偏安一隅,局限于学术体系的构建而忽视了其学术内容的社会化转换。实质上,“图书馆学是以人为核心对象的科学”^[39],“人文属性”是其学术本质,无论是古代校雠学还是现代图书馆学皆是如此,而“科学属性”则是思维模式转换对治学研究提出的新要求或新标准,是知识体系创建的方法原则,是学之所以为学的原则所在。

4.3 顿悟与分析何为治学之法

直觉体悟思维作为传统社会典型的治学思维方式,在涵育道学方面价值突出,其采用主体直觉、体悟的认识方式孕育出晦暗、模糊、言不尽意却内涵丰富的道学。但是,校雠学作为工具性存在的客观实体,不适合甚至不能运用直觉体悟的治学方法。其能历经千年繁荣发展,依靠的是其即器明道的申道价值,是间接根据直觉体悟据事论事、重事理轻学理的特性形成相应的治书、治学、治馆的经验性内容。换句话说,直觉体悟思维虽不适用于校雠学,但其思维特性却间接促成了校雠学的生成。与直觉体悟思维相比,逻辑分析法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为前提,将研究重心从主体修养转移到客观世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成为纯粹的图书馆、文献、信息、知识。在此基础上,图书馆学借用逻辑分析法中的演绎、归纳法推导出实践基础之上的一般性理论内容,再系统构建符合逻辑结构的图书馆学理论模式,为图书馆学构建出独立、抽象、系统的学术体系,从根本上改变图书馆学作为“申道之器”的附庸地位。唯一不变的是,无论是由经验总结而来的古代校雠学,还是基于实践抽象分析而来的现代图书馆学,皆以“知识管理”为学术核心,并担负起了所在时代的文化责任,这是古今图书馆学共同的价值所在,亦是中国图书馆学文脉赅续的明证。总的来说,直觉体悟思维与逻辑分析思维符合各自时代的治学需求,是各时代图书馆学最合适的治学方法。但不能忽视各自存在的不足,譬如,直觉体悟下的古代校雠学将经验总结作为学术来源,虽能完美贴合实践,但在理论指导实践上相对薄弱。而融合抽象性思维的近代图书馆学,虽能紧跟时代热点为图书馆事业指导发展方向,却因过度关注时代变化而迷失学术方向,甚至脱离实际需求造成人才供需矛盾。确实,直觉体悟思维已经不适合近现代图书馆学,但其对实际需求的关注、义理之学的重视,需要现代图书馆学选择性



学习。

4.4 意象与概念何为学术之表

无论是意象性语言还是概念性语言,其对图书馆学的影响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方式背后的思维习惯所构成的学术世界影响图书馆学的学术性质;二是语言表达形式影响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从传统学术环境来看,古代校雠学只有运用符合意象语言特性的内涵式文献管理方式,以复刻情境、心境的方法帮助读者挖掘文献的言外之意,借助“疏于定义”的类名凸显文献“言不尽意”“意犹未尽”的价值论内涵,才能满足著者、读者的交流需求以及传统学术在政教人伦方面的追寻。与近代图书馆学相比,古代校雠学过于强调传统文献的价值论内涵,令其知识论内涵隐幽不彰。学术本身也因意象语言的影响而未形成逻辑清晰、体系明确的学术系统。思维模式转变后,概念语言以其精确的定义判断赋予图书馆、图书馆学等术语明确的界定,根据定义的内涵与外延构建相互联系、浑然一体的学术系统,极大地推动了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于文献分类管理等实践工作上,图书馆学根据文献的知识内容构建了符合学科属性的逻辑体系,贴合近现代图书馆“自动实用”的发展特性。但是,概念语言的运用将学术研究带上了条理化、逻辑化、抽象化的道路,脱离现实生活束缚于理论的高墙之内。原本属于治学研究必然之法的图书馆学,就此退居二线专于文献供给,大大降低了其社会存在感。总的来说,意向语言与概念语言是图书馆学在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根据其学术特性选择的不同表达方式,符合各自时代的治学需求。它不同于价值与知识、人文与科学、顿悟与分析,无法两者兼及、优劣互补。于是,意象语言与概念语言何为最优的学术表达方式,关键在于学术自身特性而不在意象与概念之间。

5 结语

总的来说,古代校雠学的近代化发展,实质是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上深入思维模式的范式转型。古代校雠学的学术内容、学术性质以及学术价值因“天人合一”式的思维方式深受“人性”影响。主客二分思维的传入,改变了学术研究方式,慢慢淡化了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主观价值干扰,带领图书馆学走向了科学主义道路,正式拉开了图书馆学范式转型的帷

幕。但“‘范式转换’乃是一个理论扬弃与选择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断裂’的过程”^[40],借助古今思维模式的转换,能够清晰地呈现中国图书馆学由古至今的质变过程。主客合一思维模式向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发展,在本体方面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从主观世界跨越到客观世界,从根本上改变了图书馆学的发展路向,图书馆学的学术性质、内容特性以及表现形式接连转变,无论是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还是外在表现形式看,近代图书馆学皆呈现出与古代校雠学截然不同的内容,也无怪其迟迟难获现代学者的认同。但不容置疑的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无论聚焦于主体世界还是客体世界,本质皆为“知识”。“知识是人类的智力劳动的成果,是人类主观能动性 with 客观必然性辩证结合的产物”^[41],无论是自我本体还是实在本体下的知识,皆是人类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的统一,古今图书馆学即使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仍旧没有跳出知识层面。这也是为何古今图书馆学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学术取向,却皆在文本管理基础上发挥着保存文化、传播文明、安邦定国的文化功用。无论是作为义理之学的古代校雠学还是作为认知之学的近代图书馆学,有利有弊,优劣并存,都有其存在合理性。跨越历史语境判分学术好坏是不可取的,唯有回归各自时代,以身临其境的方式重新审视学术本质,理清学术发展范式,以兼容并包的精神、去粗取精的方法汲取古代校雠学优点,弥补近代图书馆学不足,才可为未来图书馆学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智慧。

参考文献

- 1 龚蛟腾.中国图书馆学的起源与转型[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262.
- 2 龚蛟腾.古代图书馆学学理反思与秉承[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3):91-98.
- 3 龚蛟腾.中国图书馆学近代化演进分析——从古代校雠学到西式图书馆学[J].图书与情报,2014(1):41-53.
- 4 龚蛟腾,方雯灿,易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重新审视[J].图书馆学研究,2018(15):2-8.
- 5 刘春云,龚蛟腾.从图书馆学视角看校雠学的近代境遇[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3):110-115.
- 6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M].济南:齐鲁书社,1999:序.
- 7 郑樵.通志二十略[M].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 8 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M].王重民,通解.傅杰,导读.田映曦,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自序.
- 9 向宗鲁.校雠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1.
- 10 胡朴安,胡静道.校雠学[M].长沙:岳麓书社,2013:1.



- 11 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M]//杨家骆.古今图书集成续编初稿:经籍典.台北:鼎文书局,1977:23.
- 12 刘春云,龚蛟腾.新文化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图书馆学近代转型的影响[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36(3):94-101.
- 13 柯平.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抽象、内核与价值[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47(6):4-17.
- 14 程焕文.略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形成时期的几个问题[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9(2):14-18.
- 1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7.
- 16 张再林.爱知之学与成人之教——中西哲学观的歧异与会通[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36-42.
- 17 胡伟希.自本体与对本体:中西哲学的诠释学基础[J].孔子研究,2005(3):4-14,126.
- 18 李一冉.大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2.
- 19 蒋永福.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特征[J].图书馆论坛,2020,40(2):26-35,44.
- 20 林彬.书馨在兹[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362.
- 21 傅荣贤.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 22 朱汉民.义理之学——中国哲学原型简析[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4(5):579-581.
- 23 李秋媛.史论卷[M]//白寿彝,启功,郭预衡,等.文史英华.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28.
- 24 永瑛,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周仁,张文,何清湖,等.整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12.
- 25 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M]//鸿烈,谢国桢,朱杰勤.民国丛书第一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
- 26 胡伟希.中国哲学:“合法性”、思维态势与类型——兼论中西哲学类型[J].现代哲学,2004(3):54-61.
- 27 杜定友.图书馆学概论[M]//陈源蒸,李万建,宋安莉.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 28 吴稼年.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学术转型——以杜定友、刘国钧为中心[J].图书情报工作,2004(10):52-54,102.
- 29 吴慰慈,罗志勇.面向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的新趋向[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6):3-6.
- 30 龚蛟腾,侯经川,文庭孝.公共知识管理学——关于图书馆学本质的思考[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3(6):2-6.
- 31 龚蛟腾,侯经川,文庭孝.公共知识中心与公共知识管理——再论图书馆的本质和定义[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6):16-20.
- 32 肖希明,沈玲.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与当代构建[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47(3):4-22.
- 33 杨文祥.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的理论起点、历史任务和研究思路[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2):26-30.
- 34 杨昭慈.图书馆学[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4.
- 35 李景新.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 [J].文化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5,7(2):100-139.
- 36 易凌,龚蛟腾.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之应然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9,39(9):19-29.
- 37 马志政,郑国平,俞惠敏,等.哲学价值论纲要[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45.
- 38 杜定友.校雠新义[M].台北:中华书局,1969:22.
- 39 蒋永福,陈丽君.人文图书馆学五定律[J].图书情报工作,2002(11):27-32.
- 40 刘君,王猛.视域的拓展与断裂的弥合——读《制度与范式: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考察(1909—2009)》的若干启迪与思考[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5,24(5):53-59.
- 41 张欣毅.触摸那只无形的巨手——基于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的认识论(上)[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3,4(1):7-11.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收稿日期:2022年1月9日

修回日期:2022年3月18日

(责任编辑:支娟)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Mode: An Analysis of the Way from Ancient Collation Learning to Modern Library Science

Gong Jiaoteng Zhu Xiaona

Abstract: Combing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with the help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situation is a fundamental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academic, observe its changes, and inherit its content. The conversion from self-ontological thinking to opposite ontological thinking formally has opened the inner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to modern library science. Academic ideals have changed from enlightenment people to highlight academic functions du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ontological concepts,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have developed from humanities to management du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methods, and academic content is adjusted from the value-oriented experience summary to the knowledge-oriented academic content du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ay of thinking. The academic system is optimized from a hybrid to a logically distinct due to the conversion of language methods. And this led to thinking about the academic nature of value and knowledge, humanities and science,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and logical analysis, imagination and concept, and to explore the academic heritage from ancient academic in the way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in differences.

Keywords: Ancient Collation; Library Science; Thinking Mod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